



摆正心态是关键
投递简历要耐心

在异国他乡求职，不仅要面对无数留学生的竞争，还有来自本土人才的竞争压力。许多学子都曾在求职过程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扰，甚至很多时候投递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连个回复都见不到。

朱瀛明（化名）今年6月份毕业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专业，现在当地一家公司从事网络应用开发。“很多简历投出去都没有回复让我比较苦恼。而且留学生的身份在找工作时比较尴尬，因为实习签证只有1年时间。许多公司考虑到1年后员工可能因为没有抽到工作签证而不得不离职，这样对公司会造成人才流失，因此他们在招收非本国员工时都很谨慎。”朱瀛明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何况中国学生都是绝顶机灵和勤奋。王贝加曾就读于美国波士顿大学。2013年毕业后，他进入劳瑞德国际大学联盟，负责多达17个国家的人力资源系统和运营流程。他在毕业之前，很早就开始投递简历，陆陆续续花



这是几天前，王贝加坐在位于上海浦东世纪大道的办公室内。参加工作仅仅3年时光，这个来自四川的中国小伙儿，在谈吐间已经很有“国际范”。

在汉堡的「交换」时光

邓志聪



我在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读硕士，今年9月参加德国的一个交换项目来到德国汉堡法学院（Bucerius Law School）学习。转眼已过两个月，慢慢地，我也适应了这里的学习和生活。

德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强调理论学习，非常重视国家司法考试（State Exam）。汉堡法学院重视职业实践教育，其教师多数是有着法律实践经验的律师，该学院建立的目的之一是挑战传统的德国法学教育体制。汉堡法学院强调法学教育的国际化，其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等33个国家的约90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与汉堡法学院合作的中国高校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香港大学。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在第3年到国外的合作学校交换。

我选择这个项目，主要是因为我对争议解决和国际商法领域感兴趣，而汉堡法学院提供的课程与我的兴趣较为吻合。我选修了国际商事仲裁、商事调解和争端解决、谈判、国际私法、国际贸易法、欧盟法、能源法、德国法概论等课程。不同的老师授课风格不一，有的教授较为重视苏格拉底式的教学，重视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有的教授则较为重视知识的灌输。

这里的实践案例教学方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在商事调解课堂上，老师会分享许多他们亲自调解的案子和调解技巧，并会通过现实案例让我们分组扮演冲突双方和调解员进行模拟调解。在国际商事仲裁课上，除了基本的理论知识和案例阅读，老师会通过商事仲裁模拟法庭的方式进行课程考核。通过在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两年的学习，我对苏格拉底式课堂、案例教学和模拟法庭都已经较为了解和熟悉，所以基本能适应这里的学习节奏。

生活上，在德国的留学生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光鲜，生活远不如在国内方便。学校的食堂只提供午餐，所以早餐和晚餐需要自己解决。学校没有学生宿舍，我只能在外面租房子，每天要坐半小时到1小时的地铁才能到学校。由于我之钱没学过德语，生活上也有一些不便之处，如看不懂地铁标志、去超市购物买错东西等。我身边的同学还碰到过租房受骗、旅行时钱包被偷等不幸的事情。但经历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和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课余时间，学校经常组织派对、短途外出游玩、讲座等活动。同学们也会自行组织集体旅行、文化沙龙等活动。班上的同学都是来自各个国家的交换生，和不同国家的同学交流让我了解到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和

文化。大家谈论美国大选、川普胜选对世界的影响、英国脱欧等。虽然有时意见不同，但大家也讨论得不亦乐乎。我还遇到了一群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的德国同学，其中很多都曾在中国留学或曾在外国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办公室工作。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和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并希望以后能到中国工作。

在这里，我越发觉得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在提高，越发感到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力的强大带来的国际形象提升，越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现在，留学不难，学成后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才是难点。对学子来说，无论回国还是留在当地，都需要在运气之外，具备课堂上学不到的更多本领。

毕业时他们是怎么找工作的？

苏木

了三四个月的时间，面试了5家公司，最后找到现在的工作。谈起找工作的技巧，王贝加说：“主要是投入时间去搜索合适的职位、修改简历和各种材料。即使90%的申请没有得到回复，我也还是按部就班地每天至少花3个小时做这件事，有时候白天上课很忙，就晚上熬到半夜三更去完成。”

实习经验不可少
文化礼仪多了解

每个国家都有其不同的文化和礼仪习惯，在求职过程中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招聘负责人对求职者

的第一印象。实习经历不仅可以帮助学子弥补这方面的缺陷，还能积累经验，成为求职的加分项。叶扬今年5月从美国福特汉姆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经过4个月的寻寻觅觅，还是没能在当地找到理想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了文化差异带来的求职障碍。“我最开始遇到的主要是文化、礼仪习惯差异带来的交流方面的问题。这不是你练好英语口语就能够克服的。求职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和招聘负责人沟通交流。有时候招聘负责人觉得你不适合这个岗位，他会推荐你到别的岗位或其他部门。但这个过程需要和他保持邮件联系或日常交往，这时就需要求职者懂得他们的礼仪习惯才能抓住机会。”叶扬说，“美国社会同样也有‘人情世故’，不专门去学很难熟练应用，比如求职邮件用什么句式表达都有固定的模板。另外，这里的公司很看重实习经验，因为实习能够带来能力提升。”

王贝加表示，利用假期在波士顿的实习和在学校担任助理的经历，对找工作有很大帮助。“中国学生在美国找工作首先要能用英语进行无障碍交流，并且理解美国人的想法和习惯。留学期间最好抓住和美国人一起工作的机会，去体验美国的办公室文化。我曾在学校帮助老师做项目、处理日常事务，也曾利用假期到当地的公司实习。这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

和美国人打交道的能力，也拓展了人脉关系。在我后来找工作时，之前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还提供了许多很好的建议，面试时也乐于帮忙。”

关注就业信息
提前做好准备

从学生过渡到职场人，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找工作并非一蹴而就的事，需要学子提早做准



为了更好地融入公司环境，薛峰（右）在工作之余和当地民众一起游玩，学习挪威语。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备，才不至于毕业时“病急乱投医”。

沙乐（化名）曾就读于美国纽约大学，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咨询公司工作。她认为在纽约找工作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关键是要早做准备。“早点明确自己的职业方向，做好规划。其实在上学期间就可以为找工作做准备，比如找些相关的实习以积累经验，这对将来就业很有帮助。”沙乐说道。

薛峰曾就读于挪威阿哥哥德大学系统开发专业，现在是卑尔根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据他介绍，他在毕业前半年就开始准备找工作事宜。“在这里，找工作的途径基本和国内一样。学校也会有校招，但可选择的较少。我是通过在招聘网站上投递简历，大概面试了四五家公司，找到了现在的工作。我们这个行业比较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在学校就要注重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如果是文科，要找教师之类的工作，还必须熟练掌握挪威语。”薛峰说道。

腾蔓曾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学习物流管理专业，现是达拉斯一家公司的制作工程师。她说：“我在学校比较活跃，喜欢参加各种活动和竞赛。我目前的工作就是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活动中找到的。毕业前，学校组织参观当地的公司，刚好他们有个空缺的职位，简单的面试之后，我就进入该公司实习，毕业之后转正成为一名制造工程师。”

（题图来源：网络）

中国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声望有了显著提升，但不少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却依旧有限。于是，作为一名“中国人”的学子，就要屡屡面临一些特殊的局面——

当学子遭遇偏见

袁怡

确实有些事
我们做得不好

留学热潮下，中国留学生遍布世界各地。他们身处文化习俗各异的国家，都遭遇过相似的“首次印象”或被强行贴上“身份标签”。

宋小雨（化名）曾在英国考文垂市华威大学交换学习。谈及当地朋友对中国人的印象时，她这样说道：“我的朋友认为，中国人都很害羞且不擅长表达自己的看法，不喜社交。她说‘我曾经有一个中国舍友，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时，她几乎不会主动加入我们’。”宋小雨无奈地说：“我尝试向她解释，或许那名女生只是因为语言有些障碍没法很好地表达自己，抑或是你们谈论的话题她不熟悉。”

“在很多外国人眼里，中国公民爱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不自觉遵守当地规则。”程松筠现就读于德国康茨坦茨应用技术大学，她这样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媒体，都有很多关于中国人在国外不遵守规则的报道。因此，我们有时候去倒垃圾还会被拦下来看看是不是按照规定分类了。”她解释说，“但是通过自己在这里一年多的观察发现，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很多时候甚至比本地人更守规矩。”

“当地人总是认为，中国留学生是‘富二代’或者很有钱，购买力强。”肖羽童现就读于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她分享了自己一次哭哭不得的经历：“大一那年，我和朋友去当地的俱乐部，一个白人男生上前搭讪。我们聊了一会后他毫无由头地开始问我是不是家里有很多豪车。”

“还有些当地人认为中国人虽然厨艺水平高，但什么都吃，尤其是狗肉、猫肉。”程松筠也表示，刚到德国的那段时间，班上学中文的同学总是十分好奇地询问我是否吃过狗肉，这样的问题曾使她有些恼怒。

“有时候这些刻板印象也不见得全是坏事”，宋小雨回顾起留学生活里下厨房的日子时说，“我的厨艺一般，做出的菜卖相也挺差。但是当地的

朋友看着我从瓶瓶罐罐里添加调料，做出来五花八门的菜式，加上做饭时带有的香味，他们都认为我的厨艺很高超。比如番茄鸡蛋面，对他们来说是一道神奇又好吃的菜。还有一道受到称赞的大杂烩，其实我只是添加了老干妈辣椒酱、橄榄油和酱油。”

当地的信息
常常都是片面过时的

学子们经过国外长期的生活体验和留心观察后，发现这些对中国的片面认识都是有迹可循的。“国外某些媒体的报道总是偏向性引导读者”，王新可（化名）曾在厄瓜多尔圣灵大学交换学习。他说：“我在国外使用当地的一些社交软件时，发现许多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全面，而且缺乏客观性。”

“错误信息的流传是导致外国人对中国存有偏见的原因之一”，程松筠说，“前几周，教授给了我们一篇2005年的中国和德国学者共同写的关于中国人旅游习惯的论文，里面所提到的概念非常陈旧甚至是错误的。其中提到中国的世界观是中国中心主义，这个常见于过去历史课本里的观念竟然还能留存于新世纪的学术论文里。尽管从外国人角度看待中国难免会有认识上的偏差，但媒体错误信息的流传对于外国人对于中国偏见的形成有着很大关系。”

“因为当地的英国人接触过一些素质不高的中国留学生和游客，会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以这些人留给他们的印象来判断其他中国留学生”，宋小雨说道：“比如他们看到一些中国游客有疯狂购物的行为，看到中国学生大多数都是用的苹果产品，就得出能出国的中国人都很富裕的结论。”

每个学子
都能改变一点点

向梦迪现就读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她谈到因为自己相对时尚的打扮曾在街头被误认为是来

前不久，笔者去布里斯托参加英国国家公众参与中心举办的年会。在学术圈里，“公众参与”（public engagement）可以说是个英国范儿十足的时髦词。尤其在最近15年，和公众及时有效地沟通与互动成为英国科技战略投资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致力于支持健康医学研究的英国最大慈善基金会——维康基金，每年单在公共参与领域就有450万英镑的预算。从我参加的这个年会的规格来看，公众参与的热情可见一斑：四五百人的会场不仅汇集了英国诸多高校的校长、各主要基金会管理者和服务于高校的专业咨询顾问等，而且会场外总是有长长的等候参会的人员队伍。

公众参与指在科技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能把公众的意见、问题或质疑都有机地融合到科研的过程中。这里包括多元化的科普（比如把研究内容变成舞台剧、或者以网络游戏等方式告知公众），让公众（尤其是相关的未来消费者、患者或受益者）成为科研的一分子，也包括直接邀请公众为科研投资方向出谋划策。当然，公众参与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对于存在争议的技术，研究人员能更好地理解公众担忧或误解的由来，并能及时作出调整与回应，加速产学研的转化。

别看好处这么多，公众参与得到重视其实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情。首先是2000年英国上议院发表《科学与技术》的第三份报告把自然科学研究和公众的沟通列入议程。2008年英国研究理事会发布《通向影响的路径》，探讨科研与社会生活融合的方法，隔年他们又发布《关于公众参与科研的协定》，确定基金会有鼓励资助项目与公众互动的责任。而2011年英国研究与咨询中心出台的“科研人员发展框架”及2012年的英国高等教育经费委员会出台的“卓越科研框架”，纷纷把公众参与列为衡量个人和高校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用我的朋友保罗·曼内尔的话说，正是这一系列的政策转向有效地促成了英国科研界“文化上的改变”，只不过在保罗这个行家来看，这个改变应该更加深入。保罗是国家公众参与中心的主任，他不仅是BBC以前好几个全国科技参与项目的制片人，而且还给国家博物馆策划过针对不同人群量身定做的科技推广活动。从吉他、足球到盆栽，这些东西在他手上都能成为建立科技对话的媒介。为了进一步推进科研文化的变革，保罗和他的同事建立了评估英国高校公共参与能效的“水印”认证体系。之所以把这个认证取名为“水印”，是因为他们觉得公共参与不是面子工程，而应该像掉在纸上的水滴一样，即使被擦掉，依然会留下清晰的印记。

一流的科研必然需要一流的公众支持。别看在一些前沿研究上中国已进入国际第一梯队，坦白说在科研与社会的嵌合上中国还有待提高。明年3月底，我所主持的科研项目将和华中科技大学联手，在武汉举办面向国内科技工作者、伦理学者和相关民间机构的关于科技风险与公众沟通的培训研讨会。保罗听了比我这个组织者还要兴奋，他说，他和同事一定会把英国最好的公众参与技巧和经验带给中国的科技工作者。

（题图来源：网络）



自日本、韩国的留学生时，有过这样的感慨：“对于这些标签和固有偏见，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的确，有很多留学生来到国外，仍过着跟国内差不多的生活，不练习英语，也不主动融入当地社会。但是只要认真去跟外国人打交道，就会发现

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态其实是开放的。我在学校合唱团认识的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都非常友好，她们觉得中国是非常酷的地方。”她补充道：“即便人们会受到固有印象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和你接触以后的感受，如果你能说好他们的语言，能够了解他们聊天的方式，能够尊重当地的习惯，他们对你的印象一定会改观。他们会把你和他认为的中国人群分开来，我想这样‘分开来’的次数多了，那些先前的不好印象慢慢就淡化了。”

肖羽童则坦言：“虽然我大学所在的城市也有很多人对中国学生有偏见，但这座城市庞大的华人移民群体为当地人提供了理解华人文化的更加客观的渠道。同时，大学里设有亚洲文化研究所，开设了高质量的中文课和文化课。我上过一位白人老师的中文课，他的中文水平很高，曾到访过中国，因此对中国了解很深。他的课堂里除了华人学生，也有许多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的其他国家的

学生。尽管国籍和种族不同，但大家都怀着一种开放的心态，不会擅自轻易地评论他人的文化习俗。”她说：“刻板印象的改变或许不是一朝一夕的，但是以我所处的环境作为例子来看，改变不是没有可能。这需要大家长期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慢慢实现。”

（图片来源：网络）